

陈梦雷“校正铜版”释考

裴 芹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经部”《周易浅述》的提要云：“国朝陈梦雷撰。陈梦雷字省斋，闽县人，顺治己丑进士。官翰林院编修，缘事谪戍。后蒙恩召还，校正铜版。复缘事谪戍，卒于戍所。……”根据其他文献可知，陈梦雷是康熙九年（1670）进士。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的提要已更正为“康熙庚戌进士。”这是清代官方文献中关于陈梦雷生平的唯一记录，是清代官方文献将陈梦雷与铜版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记载。“校正铜版”，它的语文意义十分清楚，就是校对更正铜版。“校正铜版”是否指编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呢？我以为包括了编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还包括了他主持或参与制造铜活字的工作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用他参与制作的铜活字印成的。

几乎所有历史著作、印刷史以及介绍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著作和文章，都说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武英殿用铜活字印刷的。我以为此说大可怀疑，根据有以下几点：

其一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清代最大的铜活字书，一万卷，一亿六千万字，可谓鸿篇巨制，工程浩大，用铜活字印刷要比乾隆时雕刻木活字印书难得多，为此投入的人力、物力肯定相当多，如果是武英殿印制的，那当然是武英殿的一项最光荣巨大的业绩，主管武英殿的官僚词臣，相关的文士，无疑要颂扬一番，无论是歌皇帝之功，还是扬臣僚之劳，都会笔之于史册，依常例应该在清代的文献中有所记载。可是不仅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书上没有任何反映，史籍也没有记载，个人著作文集的追记，也极其简略。陈梦雷被第二次流放后，蒋廷锡受命完成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校订装潢，可是他的文集和传记里也没有关于《图书集成》的文字。

其二，关于武英殿铜活字的记录最早见于乾隆三十八年（1776）乾隆皇帝《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》的自注：“康熙年间编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刻铜活字为版，排印藏工，贮之武英殿。历年既久，铜字或被窃缺少，司事者惧咎。时值乾隆，京师钱贵，遂请毁铜字供铸，从之。所得有限，而所耗甚多，已为非计。且使铜字尚存，则今之印书，不为事半功倍乎？深为惜之。”此后见于个人著作的

有吴长元的《宸垣识略》(1778)、包世臣(1775-1885)的《安吴论书》。以上三人对于铜活字说的不同:乾隆说“刻”,吴、包说“铸”,大相径庭。至于所制铜活字数量,更是说法不一,乾隆没有具体说明,包世臣说“百十万”,现在有估计一、二百万个的,有说25万字的,还有说二十多万字的,甚至还有说一亿四千六百万字(国子监制)的。即以20万论,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铜是比较贵重的金属,制造20多万铜活字,需要不少的铜材,是一项不小的开支,铜活字印刷工艺技术肯定相当复杂,为什么在清朝的档案中或文献中记载的如此之少而简略?

其三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《宫中朱批奏折·文教类》中有蒋廷锡的三份关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奏折,奏折中说,“康熙五十九年奉先帝谕旨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刷印六十部”,还说“康熙五十八年诚亲王折奏,古今图书集成馆纂校人员……书成之日比寻常修书之人加等分议……”,蒋廷锡的奏折不仅证明康熙朝也曾有过关于编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谕旨、奏折,还说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原是由诚亲王允祉负责的。当时允祉没有担任武英殿职务,怎么说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武英殿编印的呢?

其四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原是陈梦雷在诚亲王允祉的直接支持下编纂的,初名《汇编》,呈进后皇帝赐名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立馆加工补充。馆址设在何处,史书不载。我以为不会在武英殿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馆的人员与康熙朝其他的官编书馆有明显的特点,除允祉、陈梦雷外,既无显官,又无知名学者,陈梦雷的子侄和亲友占了很大比重,有十分浓重的家族色彩。康熙召陈梦雷回京后,并没有明文为他平反。陈梦雷上疏“乞赐差事”,但皇帝始终未给任何官职,只让他在允祉王府行走,侍候读书。康熙父子赐宅、赐地、赐衣、赐字、赐书(《御制诗集》)、赐医,生活上给与优厚待遇,甚至康熙外出巡视,也让他伴随皇三子允祉扈从,但丝毫不让他参与政治,陈梦雷多次请假回老家祭奠父母,一概不准。由此可见康熙对陈梦雷还是存有一定戒心,严格控制。康熙怎么会让这样的一群人马在宫廷重地武英殿活动呢?

其五,武英殿做为清廷编印书籍的中心是逐渐形成的。据有关文献记载,康熙十九年在武英殿设立造办处,刊印书籍只是造办处职责的一部分,人员不会多。雍正七年改为修书处,顾名思义,加强了它的编印书籍的功能。到乾隆编《四库全书》时,金简主持制造了聚珍版木活字,武英殿才有了较大的印刷能力,达到武英殿编印书籍的黄金时期。此前,特别是康熙朝为造办处时期,武英殿的印刷能力有限,所以康熙朝后期大规模编书时,众多的官编图书只有少数几种是武英殿刊印的,多数是扬州诗(书)局刊印的,更没有一种书标明是武英殿铜活字印刷的。咸丰朝的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》、光绪朝《大清会典》关于武英殿铜活字的记述,都是后代人的追记,不一定是康熙朝时的实际。如果康熙朝武英殿有铜活字,为什么多数官编图书不用武英殿铜活字摆印,而舍近求远,跑到扬州刻印呢?

其六,如果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印在武英殿,为什么雍正皇帝继位后再度流放陈梦雷的谕旨中说“陈梦雷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”,而不说武英殿处呢?说“武英殿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”不更加直接明了么?

其七,蒋廷锡接管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校订工作,完工时给雍正的奏折中说,全部装订完后“交于武英殿”。如果是武英殿印制的,为什么还要交接呢?

其八,乾隆皇帝说康熙朝制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铜活字后来“贮之武英殿”,再后来铸钱用了。铜活字是印书用的,印刷图书是武英殿的主要职责,这职责一直在加强,为什么武英殿要把完成职责的主要工具——铜活字贮存起来,弃置不用,以致销毁呢?如此,岂不是咄咄怪事吗?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确实是用铜活字印刷的,关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编纂过程、印刷地址以及铜活字的制作,现存康熙朝的官方文献中没有任何反映,史书也没有记载。我们今天研究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铜活字不得不依据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铜活字相关的材料分析,做出大概推断。

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铜活字关系最紧密的是允祉与陈梦雷。现在流传的康熙朝铜活字书籍多是允祉主持编纂的,陈梦雷不仅用铜活字刷印了允祉主持编纂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还用铜活字刷印了他的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,而以上两书的铜活字又不是同一样的铜活字。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解释。

流传到现在的清代官方铜活字书籍,翁连溪先生在《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》中说,见于著录的有五种,《星历考源》、《数理精蕴》、《律吕正义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钦若历书》;对于它们的成书时间说法不尽一致,此处不予一一考辨,概括说都印于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。范景中先生在《铜活字套印本〈御制数理精蕴〉》中说,他“曾把《数理精蕴》、《星历考源》、《钦若历书》、《律吕正义》以及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进行比较,结果发现,前四种不仅在字体、大小、风格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完全相同,而且行格、字数、书口、鱼尾、边框也完全一致。……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,内府铜活字在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那部巨著之前,还排印过《星历考源》、《钦若历书》、《律吕正义》和《数理精蕴》。”这些书的印成时间顺序待考,五种书中,有四种书与诚亲王允祉有直接关系。《数理精蕴》,据《清史稿》等书籍记载是允祉率人编的。康熙帝重视对天文数理的研究,在畅春园蒙养斋设立算学馆,积聚和培养了一批擅长这方面才能的专家学者。康熙五十二年,命允祉等皇子率何国宗等人,在蒙养斋开馆编纂天文、数学、乐律书籍。次年书成,康熙赐书名总称《律历渊源》,包括《星历考源》(有的人说为《钦若历书》改称的,待考)、《数理精蕴》、《律吕正义》三种。可能是初稿,以后又进一步加工,《清史稿·时宪志》载:“(康熙)六十年,御制算法书成,赐名《数理精蕴》”。“六十一年三月,历书稿成,并律吕、算法,共为《律历渊源》一百卷……”。编书自然是要印刷的,由此可以设想在蒙养斋算学馆编书的同时就考虑到印刷问题,开始组织人力制作铜活字。蒙养斋算学馆虽然是学术机构,不是政府部门,但社会地位

显赫,《万寿盛典初集》中收录的臣民的祝颂诗,蒙养斋与武英殿成员的诗作同样单独立类,可见当时人们对蒙养斋人员的尊崇。允祉组建自己的印刷力量,顺理成章。从事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是陈梦雷,因为他编的《汇编》也需要印刷。他在《进〈汇编〉启》中就提出“刊刻”的建议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的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也是用铜活字印刷的。但是两书所用的铜活字明显的不是同一套,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笔者详细对比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铜活字字迹,认为陈梦雷在试制铜活字的过程中,试印了自己的《诗文集》,成功后,总结经验,提高刻印水平,重新制作铜活字用来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允祉主持编纂的那些书。这就是说大约在允祉于蒙养斋开始编纂《律吕渊源》的同时,就组织人马进行铜活字的准备工作。这个过程的具体实践就是印刷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。

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印刷为两部书,分别在版心印作《松鹤山房诗集》、《松鹤山房文集》。《松鹤山房诗集》九卷(以下简称《诗集》)、《松鹤山房文集》二十卷(以下简称《文集》),序言统一放置在《诗集》开头,从版本角度考虑,该本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值得思考。

一,目录学著作一致认为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是铜活字本。但是流存到现在的铜活字书籍中,没有一种书的用字与它相同。陈梦雷仅仅是诚亲王府行走的家庭教师,他哪里有钱来制作铜活字,且印过自己的书后就废弃掉呢?如果是印书商人所为,怎么只印一种书呢?那岂不是赔大钱了吗?曾有人认为陈梦雷印《诗文集》借用了内府的铜活字,但两种铜活字明显不是同一套,故借用说不能成立。

二,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刊刻时间,目录学著作都著录为康熙五十二年,这可能是它开始的时间。《诗集》中最晚的作品为康熙五十四年,有五十六年的识语;《文集》中最晚的作品是康熙五十六年。据此可以断定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印刷完成不会早于康熙五十六年。也就是说最少用了四年多的时间。为什么不到三十卷的书用了这么长的时间?为什么《诗文集》中能有出版工作开始后新写的作品和识语?

三,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结构不完整,体例欠统一,编辑印刷粗糙。全书不署著者姓名,没有总目录。卷目录的题目与正文有异,《诗集》卷之九目录有《水村即事庆春宫》、《又满朝欢》、《又和圣朝》,正文中没有这三篇作品。《文集》十九卷的目录混印在十八卷目录内。

从《文集》的版面看,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文章为单位连续排字,一篇文章末尾无论剩多大空白,都不接排下篇文章。下篇文章另页开始。这样做不是要浪费许多版面和纸张吗?

《诗文集》设卷、叶序编排不合理。有一卷中包括数种文体作品的,有一种文体的作品设置为数卷的,各卷的文字量悬殊很大,各卷的叶数极不平衡,最多者卷九有九十叶,最少的卷四只有九叶。《论》体作品总共 37 叶,却分设了

三个卷次,而卷五、卷六、卷七都是《论》,应该统一排叶,卷五是一至十叶;卷六突然为九十至九十八、一百十一至一百二十二叶,中间空缺十二叶;卷七又是一至十叶。《诗集》、《文集》遇有尊崇的圣君帝王御钦等字多数都高出版框一两个字,而《文集》卷之一,却是一般文字低一两个格。自称“臣”、“不孝”有用小字的,也有用大字的,从“玄”的字,有用缺末笔表示避讳的,多数不缺笔。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字规格大小不匀,风格不统一;墨色不匀,有重有轻,有的呈网点状,有的笔划空心,有湮漫到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。总之,这些方面的问题,读书万卷的陈梦雷不会不知道。是什么原因使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编印得如此粗糙呢?

四,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序言共九篇,统一放在《诗集》的前面。但序言所序对象不一样,版式不一样。为说明的方便,现将序言摘要编制一份简表于下:

	撰 者	序 题	对 象	版 式	时 间
1	上清掌篆秀水楚师	序		雕版,楷书,有界栏,3叶,半叶6行,行12字	壬辰(康熙五十一年)
2	九天府掌篆钱塘乔逸人	序	诗文,留都、京邸之作,汇编之纂	雕版,行书,3叶,无界栏,半叶6行,行12字	癸巳(康熙五十二年)
3	娄江年弟王挾	序	类书三千馀卷,松鹤堂集若干卷	雕版,行书,6叶,无界栏,半叶6行,行12字	
4	长白弟能吉图	松鹤山房文集序	松鹤山房诗文	铜活字,2叶,半叶10行,行20字	
5	南兰同学教弟杨文言	松鹤山房文集序	别后所为古文辞若干卷,疏启、策论、序记、骚赋体例该备	3叶,其他同上	
6	奉天同学弟李炜	序	汇编为卷三千六百有奇,此集十二册	同上	己丑(康熙四十八年)
7	同里后学黄鸢来	序	骚赋诗篇古文辞	4叶,其他同上	丙寅(二十五年)
8	同学弟林曦	序	先生全集	2叶,其他同上	庚寅(康熙三十九)
9	温陵后学诸葛璐	无	先生之文	同上	

从上面的简表中我们可以看出:序文写作的时间相距很长,从康熙二十五年到康熙五十二年。序主见到的对象,或者说序主们所读到陈梦雷的作品不完全一样的。黄鸢来康熙三十二年为《闲止书堂集钞》写的序文中说:“丁卯(康熙二十六年)岁薄游辽左。得交先生(指陈梦雷),尽读其诗文。”黄鸢来后又

与陈梦雷在北京相遇，三十八年南归，当然看不到陈梦雷三十八年以后的作品。这“丙寅”是否笔误也需要进一步考究。杨文言康熙五十年去世，他的序言不会晚于五十年。总之九篇序言是不同时期序主看到不同的文稿写作的。从序言的印刷形态看，前三篇为雕版，各自编排叶序，第一、第二篇有界栏，第三篇无界栏。字体也不相同，有的纯为楷体，有的稍带行书味道。后六篇为铜活字版，为什么同一书序言的会有这么多版式呢？

五，流传到现在的《松鹤山房文集》为什么都是残本？流传到现在的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已非常少，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各收藏一套，《文集》都有缺卷，南京图书馆藏《诗集》和《文集》卷二十的半卷。1990年9月，我曾在北京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善本部浏览过他们收藏的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，因为时间紧迫，未得细阅。据当时的笔记：书的封皮似乎是后人重新装订的，书签皆无。《文集》第一卷前夹有小纸条，注明所藏的缺卷缺叶情况，“缺卷三、卷十二、卷十四，卷十九目录缺一页”。残叶上有“松鹤山房诗集四本”，钤有“赵州何氏藏书”印章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，未能过目，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》的著录是：“《松鹤山房文集》二十卷、《诗集》九卷，清陈梦雷撰，清康熙铜活字印本，……，《诗集》抄配，十二册，二函；缺《文集》三、十二、十四。”《松鹤山房文集》所收作品包括文体共有二十八种，《文集》所缺的第三卷在“启”与“策”之间，第十二卷在“引”与“书”之间，第十四卷在“书”与“记”之间。从一般文体分类看其间不会有什么文体作品了。那么所谓缺失是编排标志的错误，而不是作品的缺失，《文集》的作品实际只有十七卷，而不是二十卷。因为是印刷编印标识的错误，所以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“缺卷”情况完全相同。

上述几个问题显示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，有明显的试验印制的色彩，开印后增入新写的作品和识语，印刷速度、版式、编叶、字体、墨色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试验的特点。铜活字印书虽然明代已经产生，但相对于其他材质的活字，用铜制作活字及其用墨的调制难度较大，技术要求比较高，试验就成为不可少的步骤。陈梦雷近水楼台，以自己的诗文集做试印对象，试验铜活字的制作和印刷。因为需要试制铜活字，试验拼版，试验印刷。为方便实验，依文体编叶，以文章为单元排版，文章序言版式多种，不统一编叶。虽然总体组织松懈，浪费版面、纸张，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试验的进行。因为试验，所以印刷速度慢，质量差，字体稚拙，墨色不匀。陈梦雷自己编辑自己的作品，又负责组织印刷，才会在开印之后增入新的作品和识语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印刷显然比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更加精美，它们又是怎样的关系呢？

1.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字，总体上看是宋体字，但规格大小不一致，风格欠统一，可粗略分出三类：①粗壮方正型，占多数，有的字的笔划残留楷书味道，有的字的笔划粗细失称，部分合体字结构单元的配搭不和谐，书写的风格

比较稚拙。②细弱修美型,笔画细弱,字体和谐美观,较小,略长。③典型的宋体字,笔划舒展,结构匀称,锋棱尖利,其风格已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字体风格十分相近。这样的字数量较少,但它们却是我们要十分重视的,它们是制作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铜活字的蓝本。以它们为标准制造新的铜活字,就是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铜活字了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字体风格是与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里那部分典型宋体字相同的,更加流畅端庄有气度,墨色更加匀净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与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异中有同,这相同反映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铜活字是对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铜活字的批判继承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铜活字与《数理精蕴》等书的铜活字一致,说明它们用的是同一副铜活字。陈梦雷主持或参与制作的铜活字,不仅印刷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还印刷了《数理精蕴》等书。陈梦雷受诚亲王允祉的委托,得到王室朝廷的支持,自然有雄厚的财力,追求印刷的精美,不惜毁掉印刷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铜活字,制造更加规格一致、风格更加舒展大方的铜活字,是有可能的。

2.在版式方面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也有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影子。两书的版框十分接近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版框一般著录为半叶高 20.6 厘米,宽 13.6 厘米。我对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版框测量结果,和拍卖市场对拍卖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另本的版框的描述,都反映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各叶版框的高宽不是十分精确一致的,框高在 21.1 厘米至 21.9 厘米之间,半框宽在 14.6 厘米至 14.9 厘米之间。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版框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著录为框高 21.0 厘米,宽 30.4 厘米(半宽 15.20 厘米)。两书的半叶都是九行,行 20 字,通过计算可知两书的铜活字的大小约 1 厘米见方。两书不同的地方: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没有界栏,界栏处间有句读符号和侧重符号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有界栏,和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序言的铜活字版相似,因为比序言版半叶少一行,看起来更加疏朗。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版框单线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双线,外粗内细,层次分明,有立体感,所以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版面显得更加美观大方,在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。

3.陈梦雷在《进〈汇编〉启》中曾提出刊刻印刷的建议。康熙五十二年允祉受命在畅春园蒙养斋率人编纂律吕算法诸书,编成后也需要印刷。两种需要下,促成允祉组建一个印刷机构,从事铜活字的制作和印书。允祉组建印刷人马,陈梦雷是一个合适的人选,他编纂的《汇编》需要印刷,康熙五十二年前后,《汇编》待呈进,陈梦雷比较清闲。(可从他此时写的诗歌中证明)。允祉责成他参与铜活字制作是一个理想的人选,陈梦雷试验中,注意力集中在铜活字的制作方面,而不是自己的诗文集的编排,因此版面编排方面的纰漏较多,在试印开始后,又增加了新写的篇章和识语。康熙五十五年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立馆,重新加工,陈梦雷的主要精力投入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纂加工中,而相对减少了对印刷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工作精力的投入,以致留下那么多错误。试制铜活字是陈梦雷主要目的,主要目的已经达到,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编纂

竣工指日可待,急需转到印刷阶段。在印刷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的基础上,总结经验,提高制作技术,重新制作铜活字,用它们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允祉负责编纂的书籍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收录的材料最晚时间是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,蒋廷锡的奏折中提到康熙五十九年皇帝指示印六十部的谕旨,可以推断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康熙五十八年定稿,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开印。到康熙六十一年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“已刷印九千六百二十一卷”,如果陈梦雷不遭雍正的迫害,再用很短的时间即可大功告成。可惜陈梦雷被再次流放。最后印成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不仅削去陈梦雷的名字,参编印刷人员一概不显,只署“蒋廷锡校刊”。半个世纪后,纂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词臣,用“校正铜版”概括陈梦雷的业绩,十分贴切,不仅明确肯定了他制作铜活字的功劳,还暗含了陈梦雷编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业绩,而且避开了雍正对陈梦雷的指责,这样的概括实在太高明了,足见《四库全书》编纂臣僚的遣词用字的精到准确和用心良苦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内蒙古民族大学

·书讯·

十韵汇编

刘复、魏建功、罗常培等编著,精装8开,定价800.00元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

《十韵汇编》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语言学著作。它把十种韵书材料集中在一起,按韵对照编排;附广韵校勘记,并有分韵索引和部首索引。其体例之精善便利,堪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作,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此次影印以1936年初刊本为底本,书末附以魏建功《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》一文。